

社会转型与集体性焦虑：一项关于巴黎 华人东北新移民的实证调查

赵晔琴

【摘要】以“东北人”为主的华人新移民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华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备受法国社会的关注。通过对华人新移民的访谈调查，笔者提出，有别于传统的侨乡移民，华人新移民陆续进入法国社会，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或政治因素来解释，而应该更多地考察其背后隐含的深刻的社会性因素。这种迁移选择可以被看成是“城市中年一代”的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中国社会现实作出的直接的、积极的反应。

[Résumé] Les ressortissants en provenance du Nord-est de la Chine constituent une population importante dans la communauté chinoise en France depuis les années 90 du siècle dernier et attirent l'attention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Suite aux enquêtes réalisées auprès de nouveaux ressortissants chinois, nous découvrons qu'il est difficile de simplement expliquer leurs arrivées par les facteurs économique ou politique. Il faut aussi y voir des raisons sociologiques. Cette mutation pourrait être considérée comme liée au stress de la vie de « l'âge moyen urbain », une réaction face à la réalité sociologique chinoise.

【关键词】 华人东北新移民 社会转型 集体性焦虑 巴黎

一、问题提出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法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华人新移民。他们大都来自东北三省（辽宁、黑龙江、吉林）以及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大城市，他们中60%以上是单身女性^①。他们中很少有人拿到合法身份，所以为了躲避法国警察的搜捕，他们必须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②。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也缺乏关系网络，所以他们很难找到工作。除

^① Lévy, Florence. “Les femmes du Nord, une migration au profil atypique”, *Hommes et migrations*, Numéro 1254 - Mars Avril 2005.

^② 2007年9月20日，租住在巴黎10区维莱特林荫大道41号一单元房内的51岁中国籍东北女子刘

了在华人工场或中餐馆打黑工、在温州人家里做保姆之外，也有人迫于生计在美丽城（Belleville）做站街女^①。他们融入不了温州人圈子，也进入不了法国当地社会。令人费解的是：依仗着近百年的侨乡传统和在法国几近成型的关系网络，温州人前赴后继移民法国并不奇怪，而这些拥有较高学历和城市户口的“中年一代”，为何会在已过不惑之年后开始陆续离乡背井，铤而走险赴法谋生？这个新移民群体有哪些群体性特征？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放弃国内的生活，毅然走出国门？他们在国外的生活如此艰辛，却为何依然前赴后继，乐此不疲？本文将以此作为研究缘起，探究以东北为主的华人新移民迁移法国的动因机制。

二、既有研究回顾

在国际移民研究中，对于欧洲国家的国际移民的关注开始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欧洲华人群体的壮大与变化、发展，使欧洲一些国家政府认识到华侨华人研究是现实性极强的专学，并开始对此进行资助，因而推动了这一研究的发展^②。9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们开始关注欧洲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并不多^③。

春兰，因惧怕警察追捕而从一楼跳下，摔成重伤后，抢救无效死亡。9 月 21 日晚有 350 余人在出事地点举行示威活动，一批无证者随后于 9 月 22 日在巴黎美丽城也举行示威，抗议警察加强检查造成紧张恐怖气氛（<http://news.sina.com.cn/w/p/2007-10-05/112914025580.shtml>）。

^① 参见：2003 年以来法国主流媒体对巴黎中国妓女进行了大量报道。如：美丽城最早出现中国妓女大概在七八年前，根据法国警察署的统计，2003 年，她们的数量不超过 100 人，但如今可能有好几百人了。Le Monde, Horizons, vendredi 18 novembre 2005, p. 27；2006 年 5 月 11 日，法国电视 2 台播出了一个记录片《美丽城里的流莺》（Les marcheuses de Belleville），片中讲述了中国东北女人站街的情形；2013 年 3 月 16 日巴黎中国性工作者首次游行 La longue marche des prostituées chinoises,

http://www.paris.fr/accueil/accueil-paris-fr/la-longue-marche-des-prostituees-chinoises/rub_1_actu_125244_port_24329

^② 例如在荷兰，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政府两次资助关于“荷兰华人社会地位”的大型社会调查，并于 1988 年发表调查报告《荷兰华人地位》，1999 年出版第二次调查报告《荷兰华人社会地位》。在英国，1984 年，英国内政部委托属下“种族关系与移民小组”对国内华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过一项大型调查，1985 年 1 月完成了《英国华人社会报告书》，成为英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备忘录。

^③ 1998 年，英国牛津大学设立了大型研究项目“跨国族群研究”，其中的子项目之一是“在中国之世界体系的边缘：欧洲的福州人”，该研究的初期成果已由“国际移民组织”刊行，即：Skeldon 著《中国人非正常迁移的迷失与现实》和 F.Piecke 著《中国人移民欧洲的近期动向：福建移民研究》。这两本小册子以宏观描述及理论探讨为主，但缺乏有力的实证材料及剖析。2004 年夏，该项目的最终成果，由彭轲等人所著的《跨国华人：福建移民在欧洲》一书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弥补了上述两本小册子的不足，对福建移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提供了大量重要而翔实的原始资料，成为研究

在欧洲，法国是最早出现中国移民群体的国家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源源进入法国，法国华人社会人口总量持续攀升，数据显示，法国华侨华人人口总数已经从上世纪 50 年代的不足 3000 人，猛增到大约 45 万人，其规模在欧洲各国中高居首位^①。据法国国家统计局 2009 年的数据，法国华人数量在 80 万至 100 万之间，其中大部分是东南亚移民和中国浙江、广东移民^②。1990 年代初，法国城市健康与社会事务处、社会活动基金会 FAS 等共同资助由华裔学者廖遇常 (Live Yu-Sion) 主持的“法国华人一百年”专题研究及展览，并于 1995 年 1 月在巴黎举办“欧洲华人移民研讨会”，1999 年，巴黎第七大学 Eric Guerassimoff 博士得到为期三年的专项资助，主持“法国华人社团研究”^③。自 2000 年来，有关华人非法移民的报道经常见诸于法国各大主流媒体。目前每年有近 8 万到 10 万非法移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法国，其中华人非法移民已占据法国非法移民总数的 12%—25%，成为法国非法移民中的主力军之一。自 2005 年巴黎骚乱^④之后，法国政府开始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的立法，并将大大提高非法移民驱逐率。非法移民已经成为法国，甚至欧盟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也逐渐接近法国主流的移民研究。

2005 年秋，我初登法兰西，此时的法国学术界已经开始从传统的“汉学研究”^⑤转向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中国研究”^⑥，除了着眼于对中国现实国情的研究，如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农村改革问题、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⑦，部分学者

欧洲的大陆新移民重要的参考书。参见，

^① 此处依据的是在法国出版的《欧洲时报》2003 年 9 月 27 日报道的数字。

^②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③ 傅义强：《欧洲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研究述评》，载《八桂侨刊》2006 年第 1 期。

^④ 2005 年 10 月 27 日，法国巴黎北郊克利希苏布瓦镇的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在躲避警察时不幸触电身亡，为此，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和政府机关，并与警方发生冲突。骚乱事件由此蔓延至整个法国。

^⑤ 法国被誉为“海外中国学”（汉学）的创立国，有着良好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法国传统的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学、宗教、艺术和历史等领域。

^⑥ 2009 年底，法国加香高师 (ENS-Cachan) 社会科学系主办的 *Terrains & Travaux* (田野与工作) 杂志以“中国田野”为主题出版了一期专刊。该特辑汇集了中法社会学者以“中国”为调查田野或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如 Gilles Guiheux 以浙江义乌为例，分析了中国田野素材获得的可能性与路径等等。具体参见：*Terrains & Travaux*, n°16, 2009。

^⑦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CECMC) 成立于 1996 年，隶属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 (EHESS)，目前已经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中国研究的重地。除了延续传统的汉学研究之外，也有一批研究员在社会科学范畴内展开和深入中国问题研究，涉及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等各大领域。如 Isabelle Thireau 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Michel Bonnin (潘鸣萧) 对中国知青和政治结构的研究、Yves Chevrier 对北京业主抗争的研究等。

开始对法国社会的华人移民群体进行研究^①。这一研究的凸显与华人移民群体成为法国社会中的一个显群是分不开的。

纵观近三十年法国学术界对华人移民的研究，基本上遵循两个研究取向。首先是社区取向。社区取向致力于建构一个“从社区看城市”的研究思路：以华人移民社区为一个基本调查点，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华人社区的描述、分析，以及与法国本土之间的关系。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华人移民社区就成为法国社会学和都市人类学调查的主要田野。作为一个被法国社会结构化和污名化的亚洲商业空间，巴黎十三区和美丽城是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很多研究者都对这些社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 80 年代以来法国华人移民研究的主体。对于巴黎十三区，不同研究者对这个社区的叫法也不同，最通常的叫法是中国城（Chinatown），有的时候也叫三角区（Le triangle de Choisy）或者巴黎小亚洲（La petite Asie de Paris）。M.Guillon 和 I.Taboada Leonetti 在对巴黎十三区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这个围绕族群商业形成的华人社区具有很明显的种族特点，成为法兰西岛上亚洲移民的一个聚集点^②。中国商业的入侵改变了原有社区的商业网络，虽然许多法国商人怨声载道，但是他们对这种入侵却无能为力。Anne Raulin 分析了亚洲商业进入巴黎十三区的经济和结构性因素及其演变阶段。他认为，形成小亚洲的少数群体集中是城市文化的两种模式相遇的结果。空间的重组改变了当地的构成和整个社会结构^③。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丽城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移民，特别是来自浙江温州和东北地区及中国其他城市的华人新移民。Patrick Simon 在 1980 年代末就开始对美丽城进行社区调查，他指出，在社区被划分成不同种族团体的情况下，感性差异是如何在各种社交形式（如贸易往来、衣着外形、占用公共空间等）中得到加强^④。

其次是群体取向。群体取向注重获取移民个体样本，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重现迁移经历和轨迹，从而探寻国家、社会、家庭与迁移之间的逻辑关系。1991年，法国华裔学者廖遇常（Live Yu Sion）与中国学者陈旦生合作，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历程》一文，指出，法国、英国、荷兰同为欧洲最早有中国移民的国家。但是，法国有关华人的研究却比其他许多国家逊色，应做的工作仍很多^⑤。之后，法国华人研究引起了法国学术界的重视。廖遇常、马蒙（Ma Mung）在其追溯中国人移民法国历史、分析法国华人社会经济生活的文章中，主要介绍了浙江人移民法国的历史过程以

^① 2005 年 3/4 月的 *Hommes et migrations*（人类与迁移）杂志以华人移民为主题出版了一期特辑，内容涵盖中法移民的历史以及在法国华人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参见：*Hommes et migrations*, Num éro 1254 - Mars Avril 2005；另，*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也经常有关于华人移民的研究。

^② M.Guillon ; I.Taboada Leonetti. *Le Triangle de Choisy, un quartier chinois à Paris*. L'Harmattan, 1986.

^③ Raulin.A,“Espace marchands et concentrations urbaines minoritaires. La petite Asie de Paris”.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vol.85 (1988).

^④ Simon, Patrick. “Belleville, un quartier d'intégration”. *Migration et soci é* Vol4, n°19, janvier-février, 1992.

^⑤ 廖遇常、陈旦生：《法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历程》，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1 第 3 期。

及目前在法国的生存状况^①。Véronique Poisson是较早开始关注浙江移民的法国学者，他指出，法国与浙江联系的百年历史鲜为人知。而法国媒体将近年来的中国移民都贴上偷渡者的标签，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考虑到历史因素，也缺乏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人的历史见证^②。Jean-Philippe Beja和王春光从社会融入的角度研究了巴黎的“浙江村”，他们认为，巴黎的温州人在融入上没有其他优势，仅仅依靠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和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法国最边缘的经济层面，建立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领地，以此来克服在融入上面临的困难^③。Gao Yun和Véronique Poisson研究了新近到法国的华人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奴隶身份形式。他们指出，这些人来法国不到四年，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工作条件十分艰苦^④。

除了对温州移民的研究外，90年代末以来进入法国社会的东北移民成为欧洲华人社会关注的一个新问题。2000年初，法国中、法文媒体相继报道“巴黎街头出现中国大陆卖淫女”，并指出这是一批来自中国东北的“下岗女工”，在法国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⑤。同年5月，法国“语言文化辅导协会”会长马克·保罗(Marc Paul)在参加关于欧洲中国新移民问题研讨会时，向会议提交了《东北人：巴黎的中国新移民》，这是第一次在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巴黎的东北人”问题^⑥。此后，东北移民群体开始逐渐进入法国学术研究领域。2003年开始，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Florence Lévy对巴黎东北女人进行长时间的实证研究。与此同时，其他学者也开始关注法国的华人东北移民群体^⑦。除此之外，东北新移民这一地域群体也开始在海外华人移民中初露端倪。2006年，日本学者王维与香港学者钱江共同发表了美国旧金山湾区《中国东北新移民》的调查报告，他们指出，近年来迅速崛起的东北新移民已开始成为当代中国国际移民潮的主要成员之一，其中既有经济层面的原因，也有中国社会内部体制变迁的深层因素。非制度性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中的强、弱两种关系网，尤其是海外新移民社会中的弱关系网络，对当代东北人的跨境迁移活动及

^① 廖遇常：《法国华人一百年：1900年以来的华人生活》（中法文双语本）。巴黎：法国共忆协会出版社，1994年。马蒙：《法国华人社会概览》，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② Poisson, Véronique. “Les grandes étapes de 100 ans d’histoire migratoire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 *Hommes et migrations*, Numéro 1254 - Mars Avril 2005.

^③ Beja, Jean-Philippe et Wang Chunguang. “Un ‘village du Zhejiang’ à Paris.” *Hommes et Migrations*, N°1220, juillet-août 1999.

^④ Gao Yun et Véronique Poisson. “Nouvelles formes d’esclavage parmi les Chinois récemment arrivés en France”, *Hommes et migrations*, Numéro 1254 - Mars Avril 2005.

^⑤ 参见：《如何看待巴黎的华人妓女》，载《鸣锣》，2000年第1期；《法国新闻媒体眼中的华人》，载《欧洲时报》，2001年1月3日；《巴黎卖淫女中出现中国人》，载《欧洲时报》2003年9月27日；《东北站街女进军巴黎之后》，载《商务周刊》2002年第18期等。

^⑥ Marc Paul. 2002, “The Dongbei: the new Chinese immigration in Paris”. *Globalizing Chinese Migration : Trends in Europe and Asia*, edited by Pal Nyiri & Igor Saveliev,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⑦ Chloé Cattelain etc. “Les Déclassés du Nord Une nouvelle migration chinoise en France”.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vol. 21 - n°3, 2005.

其在海外移居社区寻找工作等方面做出了莫大的贡献^①。

三、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自 2006 年 1 月至 6 月间,我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了 20 多位华人移民,除了大量现场随机交谈外,我对其中的 13 人作了比较正式的个案访谈。他们中女性 10 人,男性 3 人。来自浙江温州和青田地区的有 8 人,年龄在 18—38 岁之间,其余 6 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沈阳等城市,年龄在 40—52 岁之间。他们在巴黎逗留的时间也是长短不一,最短的才五个月,最长的将近十多年。他们中绝大部分没有“纸张”,靠在中餐馆和华人工场作坊打工维持生计,年长的北方女人则更多地在老一代温州移民家里做保姆^②。

从职业来看,在被访的城市新移民中,除了一位在国内单位仍保留岗位之外,其余皆为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从受教育程度来看,相比温州移民(农村户口、低学历),90 年代末开始进入法国社会的华人城市新移民普遍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在被访的 5 位城市新移民中,4 人拥有高中学历,1 人有中专学历。他们属于改革前中国城市的中间阶层。根据李强对中间层代际更替的研究,改革前中国的城市旧中间阶层具有以下三个特点:①老中间阶层的构成主要由类似白领的干部、知识分子、国营企业职工;②年龄分布主要在 40-50 岁上下的同龄群体;③国企下岗是传统中间阶层的集体性衰落^③。随着市场转型的发生,90 年代以来,中国资源配置的方式由过去的非竞争型的计划配置资源转变为竞争型的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转型造成了资源在人群中的重新分布。这一点反映在人群的利益结构上,就是过去与计划资源相接近的群体资源的相对丧失,和更具市场竞争力的群体资源的相对获得。这种变迁表现在就业体制上,就是“铁饭碗”式的终身就业制被市场型的就业机制所取代;表现在就业人口上,就是国企职工较大量的失业与下岗;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传统的“中间阶层”的衰落^④。

显然,与来自传统侨乡的移民不同,这些来自城市的新移民大都具有较高的学历,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的国企工作、同时享有城市户口带来的各种福利保障。而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和市场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国企开始走下坡路,大批企业职工面临下岗。步入中年的他们被迫重新进入社会寻找新的谋生机会,然而,时移世易,此时的他们早已风光不再,无论是学历还是年龄上都没有了曾经的竞争优势。从响当当的国企职工到经历了集体性的衰落,沦为新的城市贫困群体。

① (日)王维、钱江:《移民网络、社会资源配置与中国东北新移民:美国旧金山湾区田野调查札记》,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② 部分访谈个案参见:赵晔琴:《巴黎中国非法移民调查》,载《南风窗》2006 年第 15 期。

③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年。

④ 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载《战略与管理》1999 年第 3 期。

四、迁移的动因机制

1、下岗：改革之殇

受访者Y，男，上海人，高中，46岁。Y因为原单位效益不好，主动向单位提出辞职，下海经商。2003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他通过蛇头组织来到法国巴黎，他妻子R于2005年初也在同样的安排下来到巴黎与他会合。他们有1个儿子，办公自动化专业中专毕业，目前在国内工作。

我原来在（上海）钢铁厂做的，单位效益不好，我就在外面做生意，厂里知道了就劝我还是辞职吧，我就索性辞职了。你知道的，很多单位这几年效益都很差的，像我们这种年纪在上海也很难找工作的，而且要文化没文化，要知识没知识的……

（受访者S02-Y0602）

受访者C，女，高中，52岁，沈阳人，来法5年。C是2000年4月一个人来法国的。家住在沈阳和平区，国内现有住房一室一厅。C因为不孕症，没有孩子。2001年C在法国被诊断出脑瘤，因此，她向巴黎当局申请了“病居留”^①。2004年，国内的丈夫得了脑血栓，养病在家。C表示，刚出国的时候就想着赚钱回去还债、养老，现在留在法国是想享受法国的免费医疗。

1997年的时候，和厂领导不和，我下岗了。接下来几年我就摆地摊，卖鞋垫、卖拖鞋，什么都卖，多了去了。他们（警察）也不让摆，轰、抓、赶什么的……后来想想算了，还是出来干几年赚点钱吧……

（受访者S01-C0601）

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随着市场转型和旧有的劳动分配体制的逐步解体，大批工人下岗离开了国有企业。下岗，是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一个新名词，主要是指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不含从农村招收的临时合同工），因企业生产经营等原因而退下原有工作岗位，但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没有在社会上找到其他工

^① 病居留，是法国政府针对少部分身患重病的移民特准的一种合法居留身份。每年更换一次，政府百分之百地承担医疗费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办理病居留曾经是许多无证者暂时解决身份和工作问题的一条途径：只需从医生那儿开出一张证明，证明某人患有某种病，正在或需要在法国治疗，就可以去当地的警察局或省政府申请病居留。近些年，法国政府明显收紧了病居留的发放。各省政府或警察局都设置了专门的咨询医生，负责对申请人提交的病历材料以及医生证明进行技术层面的审查，并就当事人是否符合病居留的两个法定条件提出意见，即第一，他的身体状况需要在法国得到救治否则会对其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二在其国籍国他不能获得适当的治疗。专家的参与审查，再加上政府移民大政策的紧缩，自然导致被拒者越来越多。

作的人员。“下岗工人”一度被喻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具悲剧色调的“活化石”之一^①。90年代中期以后，下岗工人成为中国城市中的最主要的贫困阶层，失业下岗问题几乎成为中国国内头号的、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到1997年末，中国城市下岗职工总数达1151万人，占城市职工总数的15.3%。李强等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推算，1998年全国包括下岗、待业人员在内的人数大约在1912万人。从地域上看，失业下岗人员比较集中的是东北、西北和西南的一些老的工业基地。从行业上看，多集中在工业制造和采矿业等行业。从年龄上看，下岗人员主要以40岁上下的中年人居多。文化程度以初高中学历为主。

按照李强等（2001）对下岗的研究，下岗分两种，被动下岗和主动下岗。所谓被动下岗是指本人不愿意下岗，但由于企业撤销、关闭、破产、停产等原因而被迫下岗；或由于单位改革裁减人员、个人技能条件差、劳动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等原因而被迫辞退。所谓主动下岗是指由于对原工作不满意而主动辞职。根据1998年的调查^②，在全体失业下岗人员中，被动下岗占79.9%，而造成被动下岗的最主要原因是单位裁减人员（32.0%）和企业停产整顿（28.6%）。主动失业下岗的原因主要是寻求更高的收入。

被访者W，女，高中，58岁，上海人，在法3年，2011年7月回国。1996年，W向单位提出主动下岗，自己在外面做生意。

1996年的时候，我借口妇科病从单位里出来了，不过岗位还保留着。然后在（上海）南京路上商场里做营业员，觉得做得蛮好的，后来就自己租柜台做服装生意。在南京路的商场里租柜台，自拉块，白天人家买东西开单子，交到柜台里去，实际上晚上他们再把钱还回来，每个月给4500块租金，大概做了5-6年。那个时候，单位里上班也就450块钱一个月，我出来做，总归比上班好，一个月大概能拿2000-3000块，有时候还多一点，甚至一个月1万都赚过，有时候想想很开心的。后来南京路那些房子都被国家收回去了，造新的高楼，租金越来越贵，我就不做了，开始跑展销会，海口，西安，柳州，云南，那边购买力都很高的，（买衣服）都像抢一样的，云南做的比较多，昆明，一共做了2年多。

我是96年下岗的，老公是（上海）新沪钢铁厂，2004年单位里买断的，单位一次性给了十几万，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自己找工作，基本上都在做保安，一直到去年退休。

（受访者S14-W1303）

90年代末以后，下岗工人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庞大的数量。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末有1270万下岗工人，1998年末有877万，1999年末有937万，2000年

^① 参见：“上海当年百万下岗工人就业状况调查”，<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0月27日00:29

^② 1997-1998年的调查是李强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姚裕群教授合作完成的，该调查抽取了黑龙江、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广东、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天津、重庆、内蒙古、新疆、宁夏等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并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共完成有效问卷1043份。

未有911万。这些数字只包括那些在年末还未找到工作的下岗工人^①。2001年底，我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有515万。另一个原因是，下岗工人已经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城市贫困人口的构成，学界有不同的说法，但从相关的研究来看，下岗工人无疑被包括在内。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贫困阶层主要包括两个群体：一是部分进城半年以上，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二是部分城市下岗工人、失业人员以及困难企业的职工和离退休人员^②。也有研究者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老弱病残和三无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流动贫困人口或农民工贫困人口^③。

由下岗导致的职业中断，无疑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移民陆续进入法国社会谋求生计的重要原因之一。

2、中断的婚姻

在我们对新移民的访谈中发现，除了国内职业的中断外，离婚是大陆城市女性选择海外移民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Z, 46岁，北京人，中专毕业，国企妇女工会主任。1998年，Z到西班牙马德里，在那里工作了两年。2000年的时候，她又通过其他途径去了巴黎。在巴黎一共呆了三年，主要从事的是保姆的工作。但是由于拿不到法国身份，所以，2004年Z又回到了西班牙。而因为有过之前在西班牙的工作经历，Z这次很顺利地申请到了西班牙身份。目前Z在巴塞罗那市区经营一家家庭旅馆，专门接待在欧洲旅行的中国留学生^④。

我是北京人，但我的单位在河南郑州，郑州铝厂。我们单位是国营大企业，效益不错的。就现在看来也还不错的。我原来在厂里是做妇女工会主任，我们简称叫“女工”。虽然我是中专毕业，不过说老实话，我的管理经验还是有一套的。到现在，我们单位还保留着我的工作呢！不过我都两年半没有回去过了。

我出来就是想躲避，不想在国内呆了。家庭的问题，家庭解散了（离婚了）……所以我也就出来了。我有个女儿，现在22岁了，在国内，她不爱读书，部队出来之后就工作了。

（受访者S8-Z0605）

在我的田野调查过程中，遇到了多位离异后来法的女性城市新移民，但是她们都无意地拒绝了我的访谈要求，而我对她们的了解也仅局限于随机的现场交流。

来自山东青岛的Lisa嫁给了年长的法国人，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帮助国内的女儿申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6 - 2001

^② 刘玉亭：《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③ 邓新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来源及成因》，载《中国国情国力》2008年第1期。

^④ 2006年6月，旅法的同伴们相约去西班牙巴塞罗那旅行，我们在网站上无意中找到驴友们推荐的“张阿姨家庭旅馆”。因为张阿姨的热情好客，该旅店在中国留学生中具有较好的口碑。我也借此对Z进行了正式的访谈。

请家庭团聚。我们只是通过电话做了沟通，Lisa 拒绝了我的访谈请求。对于这些畸形的异国婚姻，Y、R 也表示了他们的看法。

很多女的来这里都假结婚，和那些年纪大的法国老头，或者有十年、二十年居留的阿拉伯人结婚，为了弄个纸张。要是夫妻一起过来的，男的就叫女的和外国人假结婚……

（受访者S02-Y0602）

我的一个朋友搭了一个法国老头，已经四年了，还是没有纸张。她和我谈，没有安全感，随时随地会被踢了，今天不知道明天……

（受访者S03-R0602）

根据法国移民部的数据，法国每年发的居留证中，70%给了法国国民的外籍配偶；每年加入法国籍的人中，与法国人结婚的占了1/3。而在华人新移民的入籍中，通过婚姻入籍的比例近年来也逐步上升。为了获取身份，很多华人女性选择了异国婚姻^①。

婚姻/家庭是社会学的传统命题，也是汉学、中国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家庭作为个人基本的生活单位，承载着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功能，而在社会结构中，家庭作为一种社会设置，调整着社会结构与个人关系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有学者指出，在社会主义实践时期，由国家认定的婚姻/家庭，成为国家生活资源配置制度与居民个人生活需求之间最为重要的中介，以及各种与家庭捆绑的福利制度不断得到延伸和扩充^②。因此，在个人与国家的双重作用下，传统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稳定性非常高。1980年代改革开始，家庭慢慢退出公共领域，以个人为主体的行动者开始脱离家庭、直面社会。数据显示，80年代以来，中国这个被认为是婚姻稳定性最高的国度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婚姻动荡^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资料，1985年，中国的粗离婚率为0.9‰，1990年为1.4‰，1998年上升至1.9‰，是1985年的2倍之多^④。《2008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披露，东北三省、四个直辖市、新疆和四川已成为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地方。2009年东北三省各省份的离婚率分列全国的三至五位，辽宁省位列第五^⑤。离婚，成为90年代以来推动城市中女性海外移民的另一个重要的动因。

五、小结

海外移民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最先介入该领域研究的是经济学家，特别是在寻求解释移民动因方面，经济学领域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如“推—拉”理论、劳

^① 参见：“探究在法国为入籍而结婚的华人”，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9-05-27

^② 陈映芳：《城市中国的逻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

^③ 2010年，民政部出具报告显示“中国离婚率连续30年上升”。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⑤ 参见：《是什么原因让东北人离婚率偏高？》，载《辽宁日报》，2010年11月3日。

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等等。这些解释大多是站在经济学的立场，对于从宏观层面进行迁移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认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引发移民浪潮的主要原因，只要两个地区间存在着经济发展上的势差，就一定会引发移民浪潮，直到两地间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为止。笔者认为，对于像华人新移民这样一个并非纯经济的迁移，仅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式来解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现代化移民理论家更多地将移民视为发展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放在移民的外在原因，包括结构性的，由都市化、发展不均引起的拉推理论。在这一方面，国外社会学家也曾做过大量有益的探索，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用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来进行解释，他们认为，人口的外出或转移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简单地只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①。

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华人新移民进入法国的现象，似乎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或政治因素来解释，而应该更多地考察其背后隐含的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90年代末以来，巴黎之所以出现大规模的华人新移民群体，这与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结构的重整、大大小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是“一代人”^②的生存压力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做出的直接的、积极的反应。

从一开始单纯的打工赚钱，到后来被法国社会的种种福利制度的优越性所吸引；从起初干几年就回的念头，到现在心系着法国的合法身份，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作为行动者（*actor*）本身的新移民经历了一个从生存理性选择到经济理性选择，再到社会理性选择的过程^③。我们可以从个体/行动、城市/社会、移民空间三个维度对这种迁移行为进行解读。

第一，从个体/行动的维度而言，无论是迫于下岗失业的压力，还是离婚后斩断情丝的冲动，又或者只是出于“开开眼界”，“非法移民法国”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这种社会行动背后可能是经济利益驱使与推动的，也可能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情感色彩。按照韦伯对社会行动理想类型的分析，目的理性行动是把外界对象以及他人行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致富”、“西方幻想论”是我们在新移民访谈中经常听到的言论，也直接印证了他们为之付出苦难的最终皈依。

^① Gugler, J. and Flanagan, W.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West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8.

^② 笔者用“一代人”来指称90年代末以来进入法国社会的华人新移民，基于两个明显的人口学特征：（1）他们都来自城市；（2）他们大都出生于1955年至1960年。至出走法国时，他们大致的年龄范围属于40、50人员。

^③ 有学者在解释中国农民进城打工这一问题上提到了社会理性选择，认为农民的外出就业不仅是一种目的性的社会行动，而且带有强烈的理性选择特征，它由生存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三个不同层次构成，其中生存理性选择是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当生存理性选择得到充分实现后，经济理性选择和社会理性选择才会得以产生。参见文军：《从生存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当代中国农民外出就业动因的社会学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6期。

第二，从城市/社会维度来看，有别于传统的温州移民和福建移民，90年代末以来的华人新移民大都来自没有移民传统的城市地区，因而不断地被问题化、对象化。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城市”的解读来理解这一新的迁移潮。城市/乡村，在传统中国的研究中一直被作为分析中国社会二元结构的最有力的解释路径之一。1949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因着国家层面的发展需要而被赋予了各项制度福利与优惠措施，城市获得了与农村截然相反的优待与认同，城市人也因此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而源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机制与内生要求，这种城市社会的逻辑在90年代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改革最先开始的地方是城市，当农村社会依旧处于一片平静时，城市变革的浪潮已如燎原之火，蓬勃开展。这些城市变革、改革，促使9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蜕变。有学者用“断裂”来形容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①，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发展的两面性，一面是令人瞩目的城市速度、城市奇迹，另一面是同样令世界注目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危机^②。在问题、危机、发展、速度多重裹挟着的城市社会中，置于其中的人们无不寻找着各自的出路。对新移民而言，迁移海外或许是规避城市危机、获得重生希望之所在。

第三，从移民空间维度来看，这些个体移民的迁移行动萌发于中国经济变革的当下，因其规模、数量和有别于传统温州移民的群体性特征，而被毋庸置疑地结构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新的群体性/集体性的行为。这种跨国的集体行动，由分散于国内各城市（以东北为主）的个体迁移开始，汇集到巴黎后又分散于巴黎的不同区域，他们没有社会网络的交织，也缺乏当地的社会资本，他们的迁移行动自发构建了一个有别于传统侨乡的新的跨国移民空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罗国祥)

^①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② 陈映芳：《城市中国的逻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年。